

从“九一八”到“八一五”

徐 明

- (一) 动荡年代的北大荒和少年时期的学习历程…………… (1)
- (二) “一二·三〇事件”前后的反满抗日活动和
 长期监狱生活…………… (26)
- (三) 风云变化中的东北青年学会…………… (107)
- (四) 一九四五年冬的日日夜夜…………… (124)

从“九一八”到“八一五”

徐 明

- (一) 动荡年代的北大荒和少年时期的学习历程…………… (1)
- (二) “一二·三〇事件”前后的反满抗日活动和
长期监狱生活…………… (26)
- (三) 风云变化中的东北青年学会…………… (107)
- (四) 一九四五年冬的日日夜夜…………… (124)

从“九·一八”到“八·一五”

徐 明

（一）动荡年代的北大荒和少年时期的学习历程

一、四十年一纪故乡行

1988年8月初，我接到突泉县“建设家乡联谊会”主席李宝琛同志的来信，希望我回家乡看一看。我看到信后，思潮起伏，很难平静。

1947年春，我曾回家乡探亲一次。但当时正处于土改大风暴的漩涡中，我在家做暂短的安排之后，就行色匆匆地离开家乡了。不久，我的双亲也都迁到齐齐哈尔去了。从此，斗转星移，一别就是四十年。

四十年，在人生的旅途上，不能算是一个暂短的时间，几乎近半个世纪。家乡突泉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巨大变化？旧时相识的同年代人还有哪些人仍然健在？故土情深，归心似箭。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回忆和期望交相起伏的心情，再次回到了久别的家乡。

这次回乡，在县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使我有机会亲眼目睹了家乡工农牧业、文化教育和人民生活的发展和变化。

少年时代记忆犹新的旧突泉县城和我的出生地宝石乡徐家街村，都已经改变了旧时的容貌，很难辨认了。少年相识的同年代人，也寥寥无几了。山河依旧，景物全非。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乡面貌正在发生时代性的新旧交替的演变，一代新人也在茁壮成长。

往事历历，思绪泉涌。在回乡的旅途中，使我不能不深深地缅怀

起那个兵荒马乱、多灾多难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二、开荒斩草，马放南山

1919年旧历2月7日，我出生在实泉县蛤蚂甲（现名徐家街）村。在童年时代，这里是地处北大荒的边缘地区。山岭起伏，人烟稀少，蔓草荒烟，狼群出没。我家是从东北粮仓昌图县八面城最早来到这里的开荒户。经过多年的开垦和经营，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在民国初年，我的父亲徐风灵和伯父徐兴周，就已经成为这个村的大土地所有者了。

在这个村中间有一座大院套，东半个院是伯父家住，西半个院是我家住。在大院东侧的住户，大部是伯父家的佃户，西侧住户是我家的佃户，其中还有一部分蒙族。我家除经营农业外，还从事畜牧业，饲养大批羊、牛、马群。羊群最多时，达千余只。大哥徐连堂懂蒙语，有饲养羊的丰富经验，在这一带远近闻名。

当时，农村经济完全是原始部落性质的自给自足经济，很少有商品交换。只是到每年年末，拉一大车粮食到洮南县城卖掉，然后买年货回来，准备过年。土地耕种方法也完全是粗放式的，甚至连粪肥都很少上。但由于这一地带里土里很厚，土质肥沃，地力极强，加上每年雨量充沛，很适于谷子和小麦的生长。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没有遇到过较大的旱涝灾害，几乎大部都是丰收年。所以，到这里租种土地的佃户也逐年增加。

这时，农村社会秩序和治安状况也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强人”出没。马放南山，很少有丢失的危险。农民春种秋收，很少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扰，完全是一派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的景象。

但这里的气候条件，却是极其严酷的。每年春季很短，霜降较

早，一年大部是漫长的冬天。冬季气候，寒冷异常，从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从西口门长驱直入。刺骨的寒风，使人不敢迎面而行。很多外出农民，脸和手多被冻裂。整个冬季，人们大多猫在家里，几乎处于“冬眠”状态。

夏季虽然暂短，但周围环境却是丰富多彩的。后山坡上有一个泉，长年流水。村前有一条河，深可没膝。我们同年令的儿童，常到这里洗澡和摸鱼。在西山口门里，是一片大森林。沿河两岸，草深林密，狐兔出没，野鸟争鸣。给人一种威严不可侵犯的大自然界的神秘感觉，我一次也没有敢进入密林深处。

现在这片森林不见了。在西山口外修建了一个大水库。一片汪洋的库水，代替了郁郁葱葱的密林，使人不禁加深了苍海桑田变化的悠悠回忆。

三、“三更灯火五更鸡”

当时，在蛤蚂甲村，没有小学校，甚至连识字的人都很少。在这个村里，我的父亲算是一个屈指可数的有文化的人了。但他也只是仅仅能看书和记帐。村里绝大部分从事劳动的青年，都是文盲。

父亲为了使家里和同村的孩子们都能识上几个字，在村里设立了一个私塾馆，从外地请一位叫孙玉昆的老先生来教学。这座私塾馆，师生关系和教学方法，完全是古典式的。学生除本村儿童外，还有来自很远外村的年令较大的青年。

私塾馆是设在一个四间房相通的大屋子里。馆内是南北大炕，炕上放着很多排书桌，在书桌两旁学生面对面坐。在正面的墙上，挂着孔夫子的画像。在靠近画像的床头，就是每天老师讲课和学生背课的地方。在私塾馆内，这个地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我们当时学的课程，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共和国文》、《孟子》、《论语》和《诗经》等。我当时学的是《共和国文》、从第一册到第八册。记得第一册的内容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一身二手，大山小山。红黄兰白黑，小猫三只四只……。”由于学生文化程度不同，学的课程也都不一样。记得当时从周家炉村来一位姓周的学生，他学的是《诗经》。在我们的同学里，他算是一位很使人羡慕的高年级“大学生”了。

每天最难过的时刻，就是到老师面前去背诵课文。每个学生要把学过的书都放在一起。首先向孔夫子像行一个礼，再向老师行一个礼，然后把一落书放在老师面前，开始背诵课文。老师在中途随便提问，提到哪一句就从哪里背起。老师不吱声，就一直背下去，一刻也不许停顿。否则，就要遭到惩罚。

当时，老师惩罚学生也是很严厉的。主要是用戒尺打手板。除学习不用功外，其他如逃学、不守学规、对老师失礼和违犯学习纪律等等，都要受到严厉的责罚。学生一旦手被打后，手心往往要红肿起很高，一两天都很难消肿。

每天最难熬的时间，就是白天念书和晚间上夜课了。每天除讲课、背课和习字外，大部分时间是念书。从早到晚，坐在炕上，盘起双腿，身体不停也摇晃着，而且要不间断地大声朗读。时间一长，使人腰酸腿木，头昏脑胀，感到度日如年。

尤其晚间上课，更使人望而生畏。由于没有钟表，夜课要念三柱香的时间。在漫漫长夜里，香火如豆，香烟缭绕。学生们经过一整天的朗读，已经声嘶力竭，睡眼迷离。大家都很焦急在盼望着那根很难熄灭的香火，不知要到何时才能燃到头呀！

1926年冬，那年我八岁。孙老师回学田地附近的徐家屯教私塾馆。由于我老叔是这个屯的大户主，我又到这里来学习。白天上学，晚间就住在老叔的家里。和我一起学习的，还有叔伯哥哥徐连甲和侄子徐肇仁。

我们每天鸡叫起床，到私塾馆念早课。在途中，要经过一块坟莹地。在漆黑的暗夜里，这里经常有“鬼火”（磷火）在跳动，忽明忽灭，似远似近。使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们手拉着手，硬着头皮从这块坟莹地跑过去。

私塾馆没有油灯，每人要拿三根香一起点着，借助香火发出的微弱的光，一边看书一边念，直到天亮。孙老师为鼓励学生们的艰苦学习，他常讲：

“三更灯火五更鸡，何患乎学业之不成耶”！

我终身难忘的童年启蒙老师这两句谆谆教诲的古典语言，至今记忆犹新。它对我童年学习生活起了很大鼓舞作用。

翌年春，我家又请了一位从昌图迁到这里来的裴老师，在本村设立了新学馆。裴老师是师范学校毕业，教学方法采取半新半旧的形式，注意劳逸结合，休息礼拜日。除上课外，有时他还领着学生，到山上采集花草标本，在树林里，张网捕雀，很受同学们欢迎。

这一段的学习生活，比较生动活泼，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再不像过去那样森严可怕和不断出现逃学的现象了。

四、军阀暴政下的兵扰匪祸

在开荒拓草初期年代的和平安宁的田园生活，很快就结束了。随着“北大荒”的居民日渐增多，随之而来的官兵和土匪，也就打起各种旗号，蜂拥而起。

当时，整个东北地区正处于奉系军阀的残暴统治下，由于连年的军阀战争和兵燹匪掠，在各地的大军阀和小军阀各霸一方，趁火打劫。在这种动荡形势下，使广大农村的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民生活也处于严重的惶恐不安和朝不保夕的状态中。

寒泉县虽然地处边缘地带，但地方性的兵匪骚扰，却有增无减，日甚一日。这种在农村到处骚扰的兵和匪，实质上是一丘之貉。他们互相勾结，为害百姓。所不同的，一种是穿着灰军装的官匪，他们可以在农村明出明进，为所欲为。一种是名符其实的武装土匪，他们到处乱串，焚烧掠夺，使人防不胜防。

在童年时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老百姓对官兵的切齿痛恨。当时，主要有边防军、保安队、自卫队和地方民团等等。他们各立旗号，多如牛毛。这些杂牌军队，一到农村就横行无忌。他们的口号是：

“打粳米，骂白面，不打不骂小米饭。”

上边当官的首先要找个大户住下。不仅要吃好喝好，而且躺在炕上要把大烟抽好。记得在我家就总是招待这种作威作福的当官的。他们喷云吐雾，表现威严不可侵犯。家里人毕恭毕敬，不能稍有怠慢。下边当兵的，在外边就见鸡杀鸡，见羊杀羊，见到好的东西就顺手拿走，遇到年青的妇女就肆意调戏。有些兵痞到处寻衅，手里提着一根马鞭子，稍有不顺，就打骂交加，农民敢怒而不敢言。当时，在农村曾流传着这样一些痛恨官兵的民谣：

“一听马蹄响，鸡飞狗跳墙”；“丘八进了乡，百姓遭了殃”。

这些使人痛恨的杂牌军，在口头上虽然也高喊“打土匪”，“保护老百姓”。但他们对真正的武装土匪，却远避三舍，绕道而行。土

匪往西去，他们往东走。或者跟在土匪后边“拣洋捞”（土匪故意扔下的），然后做为“战利品”回去报功。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听说过军队同土匪相互交锋或消灭土匪的传闻。

正是在兵匪相互勾结和互为利用的情况下，在家乡一带各种土匪武装，更蜂拥而起，大有野火燎原之势。他们各立山头，到处骚扰。记得当时有名的大股土匪武装就有《红顺》、《青山好》、《老来好》、《占山好》、《打一面》等等。多则五、六十人，少则二、三十人，都是马队。他们昼伏夜出，声东击西，到处流窜，行踪不定。其他三、五成伙，打家劫舍的小股匪徒，更不在话下。

这种匪患，在当时已给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每到夜静更深，犬吠马嘶，匪情频传；风吹草动，一夕数惊。农民完全陷入朝不保夕的恐怖状态中。一些年老的农民，他们往往带着浓厚的宿命论的色彩，相互盼望和告慰地说：

“这年头兵荒马乱，何时才能太平？”

“天下大乱，真主就该出世啦！”

“真主出世，天下就能太平吗？”

“真主是上界紫微星下凡。他一出世，群魔就该归位了！”

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每听到“真主”这句话，往往怀着一种朦胧的神密莫测的感觉。后来才知道，所谓“真主”，就是“真龙天子”。封建时代的皇帝。在农民生活处于毫无保障的危机形势下，他们只能在最后一线希望转而寄托在封建时代的“真主”身上。认为只有“真主”才能扫荡“群魔”，天下太平。

三、“跑匪”和“绑票”

在最初的几年，我家和伯父家对土匪的骚扰，在思想上还比较麻

痹，没有采取更加积极的防卫措施，或购买武器实行自卫。一听到有匪情，就全家逃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躲避土匪的掠夺。当时，把这种被动的消极防卫措施，叫做“跑反”。

“跑反”，在我童年的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恐怖情绪。在这期间，不顾酷暑和严寒，不分白天和黑夜，更不管刮风和下雨。一旦听到有土匪逼近的消息，全家人就乱成一团，惊慌失措地收拾衣服，带走一切可以拿走的值钱东西，然后把家扔掉，全家坐车向安全地方“跑反”。大多时候是跑到亲属家里躲避，有时在黑夜也隐藏在山沟里。一直到匪情消失，全家才能重返家园。

最使人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是在“跑反”的路上。“跑反”往往是在夜里，这不是通常的赶夜路，而是躲避土匪的袭击。但土匪又都是“马勺子”，行踪异常诡密，忽东忽西。而且昼伏夜出，专门搞突然袭击。四野空旷，耿耿星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谁能保证在黑夜“跑反”的路上不同土匪迎头相遇呢？因此，在“跑反”的路上，就更能感到提心吊胆，危机四伏。现在想起来，仍感到余悸犹存。

但是，在当时全家人的心理状态上，实际是“闯大运”，“尽人事而听天命”。总觉得“跑在路上”要比“等在家里”好得多！每次“跑反”，全家都像大祸临头一次，都要颠沛流离一次，在家庭生活和思想情绪上都要受到一次剧然的震荡和冲击。一时很难恢复平静。

这真是充满灾难的年月和充满灾难的“跑反”呀！而且在军阀统治、兵掠匪劫的岁月里，这并不是最后的一劳永逸的颠沛流离。不久，下一次“跑反”又开始了。

但是，要来临的灾难终于突然到来了。在一个早春的夜里，我突

然在痛楚中被惊醒。睁眼一看，在屋内有很多不相识的人进进出出。他们都身带武器，翻箱倒柜，争拿东西。我一时被惊住了，不晓得这些人究竟是干什么的？说他们是官兵，又都不穿军装；说他们是土匪，又不像传说的那种“红胡子”，凶神恶煞，杀人不眨眼。这些人既没打，也没骂，而只顾争先恐后地抢拿东西……。

我的母亲也没有显出怎样的惊慌，而是默默地在应付着那些进进出出的人们，要水给水、要烟给烟，要什么给什么。一个拿枪的青年人，却一直站在我的面前，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两只眼盯着我不动。

这时，突然从外边传来大哥喊“妈呀！妈呀！”的痛叫声。我这才惊觉到这是一群土匪闯到我家里来了。大哥在院子里正在遭到土匪的毒打。原来大哥发现土匪进院后，他从后窗跳出去，向西北方向的大树林跑去。土匪发现后，就在后边追。並高喊：“再跑，就开枪！”大哥被迫停下了。土匪抓到大哥后，毒打了一顿，並做为入质。在土匪撤走时，就一起被绑走了。当时用土匪的术语叫“绑票”。

原来，寸步不离地看守我的那个土匪，就是准备如果抓不住大哥，就把我带走。这叫“绑幼票”。同时我的伯父家的大哥，也一起被绑走了。

一场防不胜防、跑不胜跑的巨大灾难，终于降临了。劫后的家，一切可用的衣物和什物，都被洗劫一空。母亲在屋里屋外整理残剩的什物，嫂嫂在炕上暗暗掉眼泪，父亲是一个开荒斩草、久历风霜的人，他从不唉声叹气。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是：遭匪抢劫是小事，宁可倾家荡产，也要赶紧把大哥从土匪手里赎回来。

很快，同土匪互通声息的“说票人”，就主动找上门来了。全家把这种人看成是一棵“救命草”，待如上宾。并了解大哥在匪徒手中的遭遇和要价。据谈，“大当家的”（匪首）很讲“交情”，只要满足要求，就把人放回。大哥在“秧子屋”（关人质的地方）也很受“优待”，吃好喝好，不打不骂，关键是抓紧时间“赎票”。

记得这个“说票人”，外名叫刘罗锅子。他整天躺在家里炕上抽大烟。一旦大烟瘾过足，他就天南海北地大讲江湖上的行规和典故。我从他那里了解到很多土匪的生活内幕和各种“黑话”。土匪对人质也分几种不同的待遇。第一种是对准备“赎票”的人质，实行优待，钱到放人。第二种对讨价还价的人质，就不断对家庭实行威胁，如仍拖延时间不赎，有时甚至给他家捎去一个人的耳朵，以示惩戒。第三种对无钱“赎票”的人质，必要时竟公然实行“撕票”（杀掉），以杀一警众。

父亲为了全力营救大哥，卖掉一些土地和牲畜，尽量满足土匪的高昂要价。至于详细情况，父亲从不向我们吐露。但从耳闻目睹的了解，除向土匪交纳大量的现金外，还送去很多马匹、大烟土和土匪需要的日用品。对“说票人”刘罗锅子的报酬，也就更难以计数了。

经过三、四个月的全力筹集赎金和赎品，终于把大哥赎回来了。同时伯父家的大哥也被赎回来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全家对大哥的平安回来，都感到极大的高兴和庆幸，同村人也都前来祝贺。这场突然袭来的浩劫，算是平安地度过去了。

经过这次匪劫，父亲和大哥开始认识到：“不搞武器自卫，安全就没有保证。”从此以后，我们两家又把大院重新规整了一下，修筑了炮台，又买了一些必要的武器，实行守院保家，不再往外“跑反”

这虽然是“贼走关门”，但从此土匪却退避三舍，在村的周围一带，不再实行明目张胆的打家劫舍了。

六、新旧学制交替中的烦恼

1928年春，我家从农村搬到突泉县城里。最先，在城西街租房子住。以后，在城东街东烧锅西侧，买了一大块房基地。在前院盖了两栋房子。后院有一个大菜园子，在中间有羊圈、马棚和牛舍。这实际是在县城里的半农牧业户。我的家就在这里长期住下来了。

当时，突泉县城虽然是县首府所在地，但仍很偏僻，人口不多。县城中心只有一个十字街。在这里，除有几家较大商店外，大部是小型临街店铺、饭馆和手工业铺。全城只有一座小学，即突泉县立第一小学校。

我这年十岁，插班到高等一年级学习，即现在的小学五年级。但从私塾馆一下子插班到高等一年级。这是两种不同的新旧学制，学习两种不同的新旧课程。一进入小学校，很多课程我都没有学过，这使我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烦恼。在语文、地理和历史方面，这些课程经过努力，是很快就可以追上去的。特别是语文，我更具有较深的基础。

但是，在数学、音乐和体操方面，却格格不入，对我完全是陌生的。特别是上数学课，由于基本的加减乘除法和口诀都不会，都得从头学起，而进度又很快，简直使我望尘莫及。上音乐课，我不懂音符和音律，只能随大家唱。一旦独唱，就完全走调了。这引起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从此，我对音乐视为“畏途”，几十年来从不能单独唱一首歌。上体操课，一走步就顺拐。体操老师问：

“你平常走路，也这么走吗？”

我面红耳赤，无言以答。这也给同学们留下了难堪的笑柄。

在学习中，这些课程像是一个个不可逾越的“拦路虎”。这使我一时陷入一筹莫展的极大困境。级任姜老师看我学习很吃力，劝我退级。我认为这是“奇耻大辱”，至死也不退级。

这期间，我经常在姨父武相阁家复习功课。姨父和姨母看到我每晚都抄写算术题，很晚才睡觉。认为我“学习很用功，将来一定有出息。”我却感到很难为情，但又无法讲出照抄同学算草本的秘密和苦衷。就是这样，我以极大的坚持力，忍难吞忧，穷追不舍，添补了一个又一个的学习空白点，终于坚持到高等小学毕业。

1930年春，在县立第一小学校院内，开始设立了初级中学校，招生一个班。由于学员不足，我们这班毕业的同学，经过简单的口试，就都考入了县立第一中学。这年我十二岁，是这个班年令最小的学生。年令最大的记得是姓郭的同学，大约有二十四、五岁。此外，家在本县城内的吉守信、聂士忠、罗永修、罗永烈、阎世康、王树香等，也都是我们这一班的同学。

进入中学第一班，一切课程都从头开始。我怀着很大的振奋心情，开始走进了这个充满幸运感和自豪感的中学课堂。并暗暗勉励自己：“从开头就要迎头赶上，千万不能掉队！”

中学开课后，我对各门课程，都尽最大努力进行预习和复习，不敢稍有松懈。特别是对英文课，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门课由孙老师任教，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在当时是我县唯一的一位大学毕业生。在我的思想上，孙老师无形中给我树立了一个追求的榜样。我想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争取自己也能上大学。当时，在中学英文课是一门主课，一礼拜有六堂课。因此，我把英文课做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每天早晨，我就到菜园子里，背诵英文单词和课文。由于环境幽

静，思想集中，进度根快。不久，我的英文水平，在全班中已居上游。这样，在我经历的崎岖不平的学习道路上，又出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转机 and 前景。

但是，一场不幸的大病又突然袭来，完全打乱了我的学习计划。这年夏天，我出了一身严重的天花，病情十分沉重，每天昏昏沉沉，卧床长达三、四个月，半年后才告痊愈。由于学业完全荒废，我已不能再回到中学第一班学习。从此，我最后结束了在突泉县的学习生活

七、“九一八”带来的民族灾难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揭开了这一蓄谋已久，侵略我国东北的历史序幕。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助长下，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在东北大地上到处横冲直闯，把成千上万的坚持抗日斗争的爱国军民淹没在血泊中。从此东北人民长达十四年灾难深重的殖民地生活开始了。

当时，突泉县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更没有直接听到日本侵略者的炮声，因而对于这样一个决定东北人民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居民中并没有立即引起强烈的惊慌和反响。我的祖父是在街内做粮店和杂货生意的。他刚从沈阳的动乱中逃回来。据说，日本侵略军到处烧杀掠夺，很多村庄被夷为一片废墟。在铁路沿线两侧的电线上挂着人头，到处是大批逃难的人群……。

听到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使人们顿时产生莫大的恐惧情绪，预感到一场不可幸免的灾祸，就要临头了。

在这一期间，由于日本侵略军还没有到达县城，但旧县政权已成空架，完全陷于瘫痪状态。而境内土匪活动，也更加猖獗。很快较多股匪已汇集到一起，已成为很大的土匪武装势力。在境内已没有任

何防御力量能与之相对抗。最后，土匪扬言要破县城。一时间内忧外患，交相袭来，使县城居民完全处于风雨飘摇和极大的恐慌不安之中。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土匪终于进攻县城了。我们全家跑到临街附近县公安局的大院内避难，幸而没有受到土匪的侵扰。整个夜晚，枪声大作，此起彼伏。实际上土匪已全部进城，只是几个防卫力量较强的大院，土匪没有进入。

次日，战斗已经停止，土匪已占领大部县城。县当局同土匪进行谈判，最后决定实行兵匪合流，拥戴县公安局王局长为首，重新整编部队，打起“抗日”的旗号，准备进攻洮南县城。但出兵不到几天，还没有进攻洮南，这群乌合之众，就中途瓦解、分道扬镳了。这样，这一兵匪合流的闹剧，就草草收场了。

在土匪的骚扰刚刚过去后，紧接着很多骑兵和轻重部队，又接连不断地从县城过境，相继向南方开去。据说，这些部队是属于张学良部驻在北大荒的边防屯垦军，他们不仅装备都很整齐，而且还拥有大炮、机枪、载重汽车和摩托车等半机械化部队。我家也不断住兵，其中也有些青年军官，並有一定的军事和文化素养。

有一次，我问一位军官说：

“你们是去打日本鬼子吗？”

他摇摇头说：

“不！我们另有任务。”

我很奇怪地又追问一句说：

“那么，你们到什么地方去？”

他笑了笑说：

“这是军事秘密。”

这些部队究竟向什么地方开去了？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个“谜”。但在当时像拥有这样武器装备精良的部队，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大约有一周左右的时间，这些部队终于过完了，以后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

不久，日本侵略军就堂堂正正地君临突泉县城了。由于镇守洮南的军阀张海鹏，投降了日本侵略军，成为伪满屈指可数的一个大汉奸。俟后，并提升为伪满溥仪皇帝陛下的侍从武官长。这样，在洮北七县广大地区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同日本侵略军相对抗的武装力量。日本侵略军在这一地区就成为和平的征服者，一个县城接着一个县城，实行“皇军”的巡回大示威，以威慑和征服广大群众，宣告大日本帝国的“军威不可侵犯”，并成为主宰这一地区的“真正主人”。

这次进驻突泉县城的日本侵略军，大约有一个中队。进城时，日本军的载重汽车和野战炮车，隆隆地驶过十字大街，震得全街地动屋摇。旧县政当局率领十几个县绅代表们，拿着太阳旗迎接日本军的到来。临街居民则是紧闭门窗，无人外出。整个大街显得静悄悄的，只有几个胆大的顽童，在街头观看“皇军”的武装大示威。

第二天，这群日本军，在县立小学校的门前广场上，实行实弹的军事演习。他们把野战炮排成一列，炮口对准着西山坡，进行长时间连续的排炮轰击。顿时，黑烟滚滚，炮声响彻全城，使整个县城几乎变成了一个战场，把整个西山坡化为一片焦土。这实际上是在用大炮的语言，向全县城群众宣布：“谁胆敢反抗皇军，就像西山坡一样，彻底消灭掉！”

在日本军驻扎期间，当街居民都采取散而远之的态度，竭力躲